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欧洲文学
与拉丁中世纪

[德] 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 著
林振华 译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欧洲文学 与拉丁中世纪

[德] 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 著

林振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 (德) 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著; 林振华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308-16426-9

I. ①欧… II. ①恩… ②林… III. ①欧洲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9617号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德] 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 著 林振华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9

字 数 818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26-9

定 价 10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谨以此书纪念

格勒贝尔（1844—1911）

与

瓦尔堡（1866—1929）

中译本序言

我很高兴为这部西方文学批评经典的中译本作序。

库尔提乌斯的巨著视野宽广却不失细致，使读者能以很多著作难以望其项背的视角，洞悉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学传统。读这本书，便是理解从罗马衰亡到（但丁的佛罗伦萨）古典学术文艺复兴的西方文学的发展与绵延脉络。作者明察秋毫，思想活跃。全书的核心在于阐明，即便在有时被贬为“黑暗时代”的那段时期，学术仍没有消失；纵观整个中世纪，不断有学者和作家延续一个丰富的传统。时至今日，世人仍未充分关注这段漫长时期浩如烟海的诗歌与散文，欣赏其独出心裁的创意，即便在西欧，情况也是如此。

林振华君将此书译成中文，无疑为中国的西方文学学者做了件好事。库尔提乌斯论述主旨不仅仅是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观念与母题。同时，他也关注超越地点、超越时间的知识与思想的原型（如“自然”等形象，“世界如书”等观念）。如此看来，他的著作不仅对西方文学学生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对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学爱好者也大有裨益。库尔提乌斯学识渊博，但他并不了解东方语言，对东方文学也知之甚少。不过，我希望此书中译本能激发东方学者从自己的文学中寻找类似的连续性，反思西欧与中国这两大文学传统之异同。

是为序。

柯林·巴罗

2014年1月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中译本说明

一、中译者最先得到《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英译本,随即以此为底本翻译。译稿杀青后有幸相继得到德文原版、法译本、西译本、意译本和日译本,便将这几个本子在校对时做参考之用。英译本于1953年问世,是《欧拉》的第一个外语译本。更难得的是,作者亲自为该译本作序;其分量可见一斑。英译本是以德文初版(1948年)为底本翻译的,成书后一直翻印,译者未再做修订¹。然而,作者在德文第二版(1954年)中又改动了近两百处内容。²因此,那些改动的部分在英译本中就无法体现。西译本(1955年)虽以第一版为底本翻译,但出版之前,译者得到了出版社寄来的第二版清样,故适时增加了第一版所没有的一些内容。法译本(1956年)则译自德文第二版。因而,三个译本中,法译本的内容最全。为此,中译者根据德文第二版校对,同时参考德文第一版、法译本、西译本、意译本和日译本,补译了德文第二版增加或改动的内容(以“【】”形式标出)。各位读者不妨加以比较,寻找作者思想变化的可能原因,甚至出版背后的故事。³

二、《欧拉》中,库尔提乌斯援引了大量著作,语种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无疑给不熟悉这些语言的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阅读困难。几个译本中,英译本只翻译了其中近七成的引文(多为前半部的引文);西译本翻译了大部分引文,但仍有部分拉丁引文未译;而法译本和意译本翻译了所有非拉丁引文。尽管如此,由于欧洲读者大多经过古典语言训练,熟悉相关原典,故并不影响阅读。考虑到中国读者的语言背景,同时也为了扩大读者范围,中译者将所有引文均翻译出来,同时附上原文。有中译本的,则选用直接从原文翻译

1 西译本和法译本的出版情况亦然。

2 见《德文本第二版序言》。1956年库尔提乌斯逝世,第二版也就成了《欧拉》的定版。

3 这里不妨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欧拉》最初是在瑞士伯尔尼出版的。在德文本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文字中,库尔提乌斯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波恩大学图书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这也影响到本书的写作。值得玩味的是,《欧拉》在德国再版时,编辑有意将这段话删掉了。莫非库翁的话戳到了德国人的痛处?

的译文，如罗念生的《伊里亚特》、黄国彬的《神曲》；没有的，则尽量寻找其英译本、法译本或意译本再转译，转译的版本以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版为主。对于无译本参考而自己又无力胜任的引文，译者请教了相关专家。

三、虽然中译本转译自英译本，但对于文中重要的概念、词语等，中译者均写出其德文原文和英译文供读者参考。

四、本书引文大部分为原文引用，少数则转引自相关译本（如第十五章涉及葛拉西安著作的部分）。对于引自其他译本的文字，英译本的处理方法是直接从德文转译。为避免多次转译（外译德，德译英，英译汉）可能导致的语义流失或偏差，中译者参考德文原版以及法译本、西译本和意译本，将这部文字的原文找出附注；同时，也希望各位读者评点和指正中译文。

五、中译本共有三类注释。第一类是作者原注，以普通脚注的形式标出；第二类是再版补注，即德文第二版和其他译本有，而英译本没有的注释，以“【】”的形式标出；第三类是中译者注，“【中译者注：】”的形式标出。

六、书中正文和脚注所谓“见本书某某页”，均指英译本页码，即中译本页边码。

七、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欧拉》，译者将 1991 年版英译本学术后记“库尔提乌斯的思想与《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诞生”（建议读完后再读正文）、2013 版英译本导读，以及 1986 版法译本导读《文献学与思辨——拉丁语、中世纪与欧洲传统》一并译出，收入附录。

八、书中所有圣经引文，除特别说明外，均摘自和合本。

九、中译者比较了《欧拉》部分译本与此中译本，附表于后，供读者参考。

《欧拉》部分译本与此中译本之比较

译 本	初版时间	翻译底本	特 点	遗憾之处
英译本	1953 年，后来版本均据此翻印	德文第一版（1948）	● 根据德文第一版翻译，最大程度反映出《欧拉》问世之初的面貌 ● 作者亲自作序 ● 收录了作者的演讲稿《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 ● 索引详尽	● 正文部分的外语引文翻译了七成左右；学术附录部分的均未翻译； ● 部分引文出处有误； ● 因所据底本为德文第一版，故没有第二版中新增的内容。

续 表

译 本	初版时间	翻译底本	特 点	遗憾之处
西译本	1955 年，后来版本均据此翻印	德文第一版 (1948)；德文第二版 (1954) 的清样	● 译者为墨西哥著名作家、文献学家、翻译家 Antonio Alatorre 及其夫人 Margit Frenk Alatorre ● 据德文第二版，也就是《欧拉》定本翻译；参考了英译本 ● 作者通读了前半部译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 收录了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作者序 ● 收录了作者的演讲稿《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 ● 增加了勘误表 ● 索引详尽	● 正文部分的外语引文翻译了九成左右；学术附录部分的翻译了一些； ● 部分单词拼写有误
法译本	1956 年，后来版本均据此翻印	德文第二版 (1954)	● 据德文第二版，也就是《欧拉》定本翻译 ● 收录了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作者序 ● 所有外语引文均翻译出来，包括学术附录中拉丁文以外的引文 ● 作者引用的转译文字，大都附上或采用了原文	● 索引不及德文原版和英译本、西译本、意译本详细； ● 部分单词拼写有误
意译本	1992 年，后来版本均据此翻印	德文第二版 (1954)	● 据德文第二版，也就是《欧拉》定本翻译 ● 收录了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作者序 ● 所有外语引文均翻译出来，包括学术附录的引文（含拉丁引文） ● 索引详尽	● 部分页码出现排版错误
日译本	1971 年，后来版本均据此翻印	德文第二版 (1954)	● 据德文第二版，也就是《欧拉》定本翻译 ● 收录了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作者序 ● 所有外语引文均翻译出来，包括学术附录的引文（含拉丁引文） ● 索引详尽 ● 增加了译者注	● 暂无

续 表

译 本	初版时间	翻译底本	特 点	遗憾之处
此中译本	2016 年	英译本	● 参考了德文第一、第二、第十一版以及英译本、法译本； ● 补充了德文第二版中新增内容，并清楚地标示出来； ● 尽力订正了英、法、西译本中的错误； ● 收录了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作者序； ● 收录了作者演讲《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 ● 增加了导读、介绍等有助于理解原著的文字； ● 作者引用的转译文字，均附上或采用了原文	● 未从德文版翻译； ● 外语引文很多为转译

中译本导读

文化废墟上的罗马象征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论略

胡继华

引言：经典及其命运

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无疑是一部经典之作。经典之作，自然有经典之作的共同命运。有言戏谑：所谓“经典之作”，就是人人都说重要却无人真正阅读的作品。诗人 T. S. 艾略特与其作者交往密切，且有深刻的思想互动。可是，当他同这部“鸿篇巨制”第一次亲密接触时，却担心没有时间通读它一遍。艾略特语气夸张，意蕴反讽，但他对于《欧拉》所呈现的古典象征秩序及其神圣同一性却早有措思，知会颇深。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将欧洲文学与文化传统理解作为一种“过去性”与“现在性”共时存在的历史意识。怀藏着这么一种历史意识，人们就能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的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¹ 库尔提乌斯霸才笔健，《欧拉》行气如虹，巨笔建构出伟美的罗马象征，将上起荷马下至但丁的欧洲文学把握为一个拉丁中世纪的神圣秩序，并且执着地传承欧洲古典文化精神，在传承中创造和散播新人文主义，以期拯救陷于危险的“德国精神”，甚至拯救衰微没落的“统一的欧洲”。

《欧拉》全书聚焦于“纯粹的文学性”，以形式自律为立论之本。这一论述逻辑和叙述策略激怒了古典语文学家列奥·施皮策。一气之下，施皮策不仅于 1933 年放

1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2 页。

弃科隆大学的教职，还严厉批评《欧拉》的作者在“教育野蛮化”的极权势力兵临城下的危境下出此逃避之策。退缩到文学地窖，将历史墓地作为避难所，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助纣为虐。¹可是，施皮策有所不知，《欧拉》的作者也像他一样，都是衰败的欧洲文化家园里的“内在流亡者”，对自己的祖邦怀有一种与日俱增、难以名状的厌恶感。不无象征意味着的是，《欧拉》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并不是在德国出版的，而是在瑞士伯尔尼一家出版社印行的。在纳粹政权时代，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施皮策还先后流亡到土耳其。流亡者没有家园，唯有长歌当哭，远望当归。在远离欧洲的异邦土地上，一方面以记忆深描文化，以整体观照欧洲，从破碎之中重构文化秩序；另一方面以流亡寻求统一，以比较展示差异，“比较文学”学科于焉形成，所以“比较文学始于比较流亡”。²

《欧拉》诞生后半半个多世纪，毁誉随之如潮：誉者誉之过度，说其作者乃博学鸿儒，其书乃欧洲文化原创性的百科全书，推进了欧洲思想的统一进程，建构了西方文化的神圣秩序；毁者毁之无情，说其作者是自诩精英的中产阶级之代言人，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暗通款曲，其书夸夸其谈，思维保守僵化，蔽于陈规陋俗，扼杀个体自由，有碍文学创新。

然而，“乾坤一台戏”，“天地一卷书”，书卷决定了灵魂在永生之中的命运（《启

1 Leo Spitzer, "Review of *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y Ernst Robert Curtiu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949), pp. 425-431.

2 参见莫亚萍：《当西方遇见东方——比较文学与全球翻译的范式在伊斯坦布尔的呈现》，王柯平主编《古典诗学与浪漫灵见——2012年十月学术论坛文萃》，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251—265页。又见：Emily Apter, "Global Translatio: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 胡继华编著《比较文学经典导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5—153页。关于这批流亡者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贡献，《比较文学经典导读》作出了这样的概括：“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对犹太知识分子展开大举迫害和无情放逐。欧洲一些大学的知识精英、专家学者背井离乡，流亡异邦。这些从纳粹欧洲流亡异邦的人，其中就有斯皮策、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这样一些往昔日耳曼罗曼语传统学者，以及沐浴高古学华彩的古典学家。可恰恰就是这么一批回首来路欲归无计的流亡者，用客居异国的疏离感凝成了今天所谓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开始于流亡。那些丧失了图书馆、研究所、学术同道以及学术氛围的欧洲知识分子，那些疏离在欧洲‘真实文化场’之外的专家学者，身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飞地’——伊斯坦布尔，在极端绝望的心境下，通过自己艰辛的学术研究，延续着欧洲人文主义，默默地把欧洲的良好心升华为在离乱与苦难的世界上。所以，那些惨遭放逐的欧洲人成为一些远离理智、民族和文化氛围的‘孤魂野鬼’，他们不仅发明了‘比较文学’，而且还缔造了‘全球人文主义’。”（第150页）

示录》20:12)。不仅如此,书卷自身的命运也是文化兴衰节奏的隐喻,因为一卷书自然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从狭义的文学学科而言,《欧拉》、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和柯默德的《结局的意义》,都展现了各自独一无二的世界,构成了文学批评领域激动人心的景观,演示了从文本碎片重构文化整体、由个人经验通达历史意识的批评方法。它们的启示,让专家受益,更让“文学之爱者”蒙福。它们启发读者,放眼古今,超越国界,涵濡自我与他者,叩显而开隐,烛照微言大义,把蕴含在文学之中的文化理解为生生不息的精神,把古典传统理解为自我保存和自我传播的整体秩序。然而,在《欧拉》的写作环境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几近枯竭,整体的文化秩序已经支离破碎,德国和欧洲精神陷于危境中。危境自然引发普遍的危情,更有忧郁的悲情。

一、“赏析之作,忧患之书”

“《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恰在《欧拉》问世的同年(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钱钟书自序其书,夫子自道。对于《欧拉》,亦可作如是观:寓忧患于赏析,含政治于学术,融义理于辞章,于个体修身养德,于群体经济治平。“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¹正声微茫之世,存亡续绝之时,钱钟书和库尔提乌斯不约而同地为“文学之爱者”奉献一部赏析之作,自然不只是好事“帮闲”,无聊“帮忙”。“文运”正变兴衰,牵扯着“世运”起落沉浮。作为个体而存在,文学研究者兴趣的转向同文运、世运休戚相关。²

库尔提乌斯是古典语文学家格勒贝尔(Gustav Gröber, 1844—1911)的亲传弟子,

1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页。

2 在《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一册,钱钟书就两次引用《欧拉》:(1)“耶稣悲世悯人,其荣常戚戚,终身不开笑口”(第158页),这里指涉《欧拉》德文版第492页;(2)“盖信事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肯扬言其聪明正直则一、凭依在德,此敬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第309页),这里指涉《欧拉》德文版第180页。超越字面引用或者提及,钱钟书“管窥锥指”、“大题小做”的治学思路也颇暗合库尔提乌斯的“洞察幽微”(specification)与“综观全局”(universalism)辩证合一的研究方法,洞察幽微是古典语文学的方法,综观全局是历史整体和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这种暗合表明,从文本碎片重构文化整体、由个人经验通达历史意识,不仅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而且也是应对文化危机、挽救文化整体的历史意识之呈现。

是拉丁学家埃伯特(Adolf Ebert, 1820—1890)的再传弟子。以语文学方式治学,库尔提乌斯严守古典学家法,研治新版古法语《列王记》,探讨法国批评家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 1849—1906)的文学思想。以柏格森、罗兰、佩吉、纪德、克洛岱尔、巴雷斯、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瓦雷里等文学巨星为媒介,法国文化和思想悄然进入库尔提乌斯的血脉,一个崭新的法兰西世界在他的心空冉冉上升,朗然而且瑰丽。通过这部借文学为媒介呈现的法国文化史,神圣不朽的欧洲文化统一秩序得以传承——一条“伟大的存在之链”贯穿古今,从未断裂。一旦神圣秩序破裂,存在之链断裂,欧洲文化的精神就陷于可堪忧患的危境之中。本着柏格森式的直觉,库尔提乌斯敏锐觉察到这种危境,义无反顾地告别法国,掉背孤行,意欲“回到更古老的意识层面,首先便是罗曼中世纪”。在冥冥之中,他寻找一条通往罗马的道路,重构“罗马象征秩序”。初访罗马,他就感到罗马是一座圣城,祖先的故土,朝觐的目标,慕悦的对象。帕拉蒂诺山上帝王宫殿的遗址,无言地向他诉说着罗马帝国的永恒荣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油然而生:自己属于“永恒的罗马”。这份忧郁的乡愁,这份神秘的归属关系,蕴含着充满多种象征意义的奥秘。罗马象征秩序,为千年万载的欧洲提供了经天纬地的永恒尺度。“成为罗马公民”,“获得帝国公民身份”,便成为库尔提乌斯灵魂深处书写《欧拉》之最隐秘的动机。

1932年,库尔提乌斯发表《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描述德国偏离罗马象征体系,欧洲精神的野蛮化,理智主宰地位的去势,种族怨恨的涌动,以及传统人文教育的衰败。所有这一切征兆,均为欧洲败落的表征,纳粹政制的特征。于是,他果敢切断通往法兰西之路,而转身朝着拉丁中世纪漫游,呼吁一种新人文主义,一种贯穿了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整个中世纪的经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为经典古代招魂,乃是迫于德国进退两难的现实——背叛罗马帝国的志业,又徘徊在欧洲之外。焦虑与怨恨交织,绝望与妄念并存,库尔提乌斯及其同时代的人对德国精神的复兴深信不疑,同时面对最为深重的历史危机束手无策。库尔提乌斯在1932年这个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对自己所处身其中而日渐荒芜的现代性感到万分茫然。他不断地提及查理曼帝国的历史个案,苦苦地追寻中世纪的经典古代模式与近代德国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现代性作为中世纪神圣秩序的世俗化,因而现代政治同基督教的神学绝对主义之间存在着模拟关系。洛维特、施米特以及布鲁门伯格对于现代与中世纪关系的描述,也镜像式地映射在库尔提乌斯对于欧洲历史的整体性反思

之中。¹在他的构想中，羸弱的德意志帝国对于伟大的查理曼帝国，永远怀有一种怨恨而又羡慕的矛盾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近代历史的张力。德国精神在当下陷于危境，乃是因为德意志背叛了查理曼的事业，决裂了罗马象征体系，种族怨恨甚嚣尘上，教育野蛮化畅行无阻，破坏性的文化无时不在，虚无主义长驱直入湮灭了人文化成之道（*paideia*）。反抗邪恶的种族主义，拒绝狭隘的爱国主义，库尔提乌斯祈望从古典人文主义之中提炼出超民族的人文主义，借以挽救在现代进程中濒临灭顶之灾德国精神，借以矫正欧洲在现代世界上的偏航。

欧洲一旦偏离了罗马象征体系，经天纬地的人文主义尺度就被绝望地废黜了。一旦废黜了这一永恒的尺度，欧洲思想活生生的统一制序就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蛮夷今天到来。皇帝在静候，恭迎蛮夷的首领。”²20世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 1863—1933）的诗句，夸张地呈现了现代欧洲的野蛮化灾难。罗马皇帝膜拜蛮夷，甚至礼拜金色怪兽，意味着虚无主义一统欧洲，人文主义病入膏肓，一场末日学的灾难自空而降。蛮夷长驱直入，宣告“精约之世”（*era of concentration*）寿终正寝，而“博放之世”（*era of expansion*）如期而至。早在1908

1 洛维特认为，现代性历史意识乃是基督教救恩史观念（尤其是天道神恩和末世学有限性观念）世俗化的产物：“现代人通过把进步意义上的各种神学原则世俗化为一种现实，并运用于不仅对于世界历史的统一，而且也对它的进步提出质疑的日益增长的经验认识，构造出一种历史哲学。”（《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5页）施米特断言，“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页）在现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述脉络、叙述架构之中，中世纪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通过“世俗化”、“进步”、“模拟”等概念得到了呈现和把握。然而，布鲁门伯格却认为，“世俗化”概念是一个显示现代性时代错乱的概念，“进步”概念被纳入了一种乌托邦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因而它们并不具有合法的解释权限和透视力量。与洛维特针锋相对，布鲁门伯格认定，世俗化和进步观念所许诺的“未来”维度乃是一种内在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一种类似于救世主降临、世界末日等类似的超越性干预；所谓“世俗化”，所谓“进步”，说到底只不过是秩序的颠转，以观念代替观念的方式重新占有某种优势位置（*Umbeseitzung*）。现代之合法性，不在于将基督教末世论观念世俗化，而在于“人的自我伸张”（*Selbstbehauptung*）。对施米特的论点有谨慎的保留，布鲁门伯格又断言，“政治神学”或许只不过是一系列隐喻的汇聚。现代合法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要义并不是神学概念的世俗化，“这个时代的合理性才被理解为自我伸张”。参见 *Hans Blumenberg, 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35ff., 99ff.

2 参见斯潘诺斯：《现代人文教育中阿波罗的威权》，胡继华译，《中国文化》2014年秋季号，第40期，第136页。卡瓦菲斯这首诗题为《等待蛮夷》（又译《等待野蛮人》），译文还可参见《卡瓦菲斯诗集》，黄灿然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年，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发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哀叹大雅不作，世衰道微，将现代精神的危境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今世延续文艺复兴所开启的“博放之世”，解放思想笼罩一切，“官觉之解放”、“理智之解放”，以及“良心之解放”，构成了近代最基本的特征——“专重智识及同情之开拓”。“而文艺复兴时代之人，正具爱玛生所谓智识饕餮，若辈急求脱去中古传说之羁勒，又深幸自然与人性今得合一而息争，狂喜之余，遂谓礼文与选择毫无需要。如拉伯雷盖礼文与选择二者皆非所具，虽有伟大天才而不得谓为合于人文。自古人观之，乃为未开化之野人也。若此专务开放个人之才智机能，无轨范，无训练，舍节制而乐自由，遂生博放时代所特有之恶果，漫无标准，凌傲自是，放纵自恣，于以加甚，或竟足危及社会之生存，于是社会起而反抗个人，而精约之时期继之。”¹“博放之世”废黜了“礼文与选择”，拒绝了“轨范与节制”，可谓斯文扫地，礼乐沉沦，没有温柔敦厚的美德，却有目无纲纪的张狂，没有中正节制的虔诚，唯有自我伸张的虚妄。卢梭张扬感情自然主义，将古典人文主义湮灭在异教神的狂欢盛典。“魔鬼被认为是始终否定的力量”，使理性获得驱动力的唯一方式是将美德转变成一种更专横更骄奢淫逸的激情：“眩晕就是国王，它赶走了宙斯。”²由狄奥尼索斯为主角的浪漫主义“新神话”以统一的名义发起了一场“系统的生命叛乱”，分裂了古典理性主义的透彻澄明的制序。

“系统的生命叛乱”（Systematische Triebrevolt）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对现代人的理念的描述。舍勒所见，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颇为契合：现代人放弃了富有意义的象征制序，而放任情感生命。“人的生命驱动力在新世纪里对片面升华的一种系统反叛……在欧洲已成了时尚”，“生命女神”取代了“精神女神”。这种貌似“后大战现象”，却是一种深深根植于欧洲历史之中的黑暗“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人的反叛，黑暗的反叛，任性的反叛，本能的反叛，都将出演世界剧场的启示录戏景。于是有必要建立新的均衡，实现人的“谐调”——种族的谐调、人性内在的谐调、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谐调、欧洲与东方的谐调、人类生命与其生命范本的谐调。现代人进入谐调时代，“就必须再一次学会把握那种伟大的、

1 徐震堦译：《白璧德释人文主义》，《学衡》，1924年10月第34期。这段话的现代汉语译文见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2 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7—108页。

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领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同时还有世界进程与其第一推动力演变之间的同契性，以及这个第一推动力和世界进程的同契性”。¹一望便知，舍勒的“谐调时代”愿景及其普遍的“同契性”，乃是库尔提乌斯“普世的人文主义大同境界”的基本元素。舍勒对库尔提乌斯的影响，见于《欧拉》全书。《欧拉》开篇，他就引用了舍勒的话来描述“时代精神的危境”：“曾几何时，自由的学术研究与思想体系联合起来，反抗至高无上的教会对头脑的禁锢。然而，作为两者的联合体，民主扩张却悄然成为思想自由的最大威胁。在西方和（可能的）北美，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戈拉的那种民主正死灰复燃。”²在舍勒和库尔提乌斯看来，民主的扩张乃是过度的自我伸张，不仅不利于道德和社会的进步，而且成了思想自由的敌人，从而加速了教育的野蛮化，恶化了现时代精神的危境。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将这种现时代精神的危境称为“世界危机”：“构成人类世界几千年的东西正面临着崩溃”，“历史的文明和文化脱离了它们的根，沉浸在技术经济的世界中，沉浸在空洞的理智活动中”³。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长歌当哭，哀叹“德意志精神的终结”和“西方的没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斯宾格勒用玄学的诗学的方式把握到了现代世界所遭遇的三大挑战：“文化”丧失生命而蜕化为“文明”，生活的技术层面与生存的道德层面永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以及自由主义对意义的剥夺、对文明的破坏、对宗教的摧毁和驱使国家走上毁灭的不归路。所有这一切，都是欧洲偏离罗马象征秩序的危险征兆。象征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国际大都市，已经耗尽了古代城邦的田园诗意，湮灭了罗马帝都的神圣灵韵，“金钱和智力”为它们最后的胜利而弹冠相庆，人与自然之间原本惬意的纽带无法修复地断裂了。⁴

《欧拉》成书于1932年至1948年间。这是一个被斯洛戴蒂克（Peter Sloterdijk, 1947—）称之为“后历史的时代”：“构成历史的欧洲扩张载体的潜在能力已经灭绝”，

1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31页。

2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

3 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38页。

4 赫尔曼：《文明衰落论——西方文化悲观主义的形成与演变》，张爱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3—245页。

“旧世界已经在对星球本身的开发当中将初始的潜能消耗殆尽，它剩余的能量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挥霍一空”。¹在这种严峻的精神危境当中，库尔提乌斯采取了双重“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回到“文学的地窖”，打开通往人类思想共同遗产的大门；退回到拉丁中世纪，在孕育了全部生命的源头活水之中沐浴疗伤，在野蛮人和异教者的掌控下拯救查理曼帝国遗产，在信仰缘光的烛照下从人的谐调之中获取新的精神能量。以退为进，便为欧洲以至于普世的人文主义发掘出“一种令人惬意的理智不在场之证据”（a welcome intellectual alibi）。²为完成这一使命，库尔提乌斯怀着千禧年主义的梦想，在冥冥之中走上了一条通往罗马的道路。

三、罗马象征体系

在战争的阴霾笼罩欧洲的时刻，库尔提乌斯忧心于陷于危境的德国精神，从当代法国文学研究中抽身而出。因为他感到，尽管法兰西传承了统一的欧洲精神，但它仅仅是为彷徨歧路的德意志和败落下行的欧洲展开自我认同提供了一个有限的视角而已。重访古典人文主义，为欧洲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仅有现代性和法兰西是不够的。现代性和法兰西，在历史进程之中“内在性”有余，而“超越性”不够。所以，库尔提乌斯必须切断法兰西之路，而转身通往罗马。“树立一座比青铜更长久的丰碑”，唯有借着罗马象征体系及其中世纪的传承。对于心系“欧洲意识与文化遗产”的库尔提乌斯来说，罗马之重要性在于：罗马帝国及其超越的象征体系，为欧洲精神提供了统一的架构，赋予了欧洲历史化图景的灵魂，呈现了人文主义的原始母体。罗马象征体系是历史秩序的写照。“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历史进程仍可被理解为一场为实现真正秩序的斗争”。³库尔提乌斯以文学为媒介来观照欧洲文化及其传统，也是将欧洲图景历史化，为实现真正秩序而斗争，为救治欧洲的现代偏差而奋斗。“历史被理解为一个日益疏离的对于存在秩序的洞察过程，而人类以其

1 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常恒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2 Peter Godman, “Epilogue”,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29.

3 Eric Voegelin, *Israel and Revelation*, ed. Maurice Hogan,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9.